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 居留意愿的影响

——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的验证

孙红玉 叶学平

摘要: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 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CMDS) 来构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 可以厘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相关实证结果表明,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越高, 其居留意愿就愈强, 越倾向于居留流入地; 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及流动特征对其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 而不同队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 政府应持续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重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感的培育, 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消除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 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创业。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流动人口; 身份认同; 公共服务均等化; 居留意愿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22)09-0028-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的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 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的总体特征。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显示, 截至 2020 年, 我国流动人口达 3.758 亿,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 69.73%。不可否认, 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流动人口已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 大量流动人口也呈现出“钟摆式”流动、“青出老回”和“漂泊于城市”等特点^①, 其根本原因在于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市民化。从本质上来说, 市民化意愿是留城发展或定居的意愿, 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 无疑成为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问题。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要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

进程, 解决流动人口城市居留的突出问题”。2022 年 5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再一次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 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

事实上, 哪些因素影响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 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既有研究一般从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制度约束等层面来分析哪些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也是其个人身份构建的过程^②, 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无疑会受到其身份认同的影响。而对于身份认同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居留意愿问题, 学术界则较少涉及。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个体对所属群体身份的认可, 是一种对价值和意义的承诺和确认^③。许多学者认为,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

等问题的思考及认知^④。从制度层面来看，身份认同已成为新移民融入城市必须重视的前提^⑤。因此，从身份认同角度来探讨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文借鉴身份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从主观认同、社会包容、就业情况、权利保障4个维度构建了身份认同指数，实证检验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强调政府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中，应该重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感的培育，消除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近年来，经济学开始关注身份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George A. Akerlof 等将身份认同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身份认同的效用函数，研究认为个人身份认同决定自身社会类型（群体集），身份认同会与社会的行为规范相对应，最终影响个人的经济决策^⑥。

依据身份经济学理论，个人效用函数包括身份认同和行为规范，一个社会由不同人群构成群体集C，每个人 ε_i 和行为 a_i 决定其群体归属 c_{ij} ，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I_i 。每个群体C都存在最优行为规范 P_j ，如果一个人的实际行为 a_i 与其所属群体的最优行为准则 P_j 相违背，这个人就会产生焦虑和不愉快的感觉，效用相应会降低。在身份外部性的作用下，群体内其他个体的效用也会随之降低，于是其他个体可能作出相应的负反馈，从而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行为博弈。

个人的效用 U_i 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a_i ，还受到群体内其他人的行为 a_{-i} 、个人身份认同 I_i 的影响，其效用函数如下：

$$U_i=U_i(a_i, a_{-i}, I_i) \quad (1)$$

I_i 受个人行为 a_i 、他人行为 a_{-i} 、群体归属 c_{ij} 、个人特征 ε_i 的影响，最优行为准则 P_j 为外生变量。

$$I_i=I_i(a_i, a_{-i}, c_{ij}, \varepsilon_i, P_j) \quad (2)$$

依据上述理论，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影响个人效用函数 U_i ，进而对个人经济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流动人口作为经济理性人，在选择行为过程中必然会使个人效用达到最大化。在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选择在流入地居留是流动人口实现效用最大化而作出的最优决策。据此，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

假设1：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越高，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就越强。

流动范围一直是人口迁移领域的经典命题。谢东虹从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式双重维度探究了迁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发现迁移距离越近，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跨省迁移是最有利的迁移模式^⑦。祝仲坤等研究发现，与省内迁移相比，跨省迁移会降低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其城市融入^⑧。杨菊华等通过比较流动人口的区域差异，发现流动距离越远、行政跨度越大，流动人口面临的区域阻隔、地区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的差异越大^⑨。社会环境的变化给流动人口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市民”身份带来了巨大困难，从而会降低其居留意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流动人口流动范围越远，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越弱。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按人口规模比例抽样的PPS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机抽取样本。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15周岁以上的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范围限定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流动范围、流动时间、身份认同等问题填写完成的样本，剔除异常值和极端值及未明确答复的样本，最终选择了来自31个省份的45843个样本。

（二）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参考Y. Zhu等学者的研究^⑩，该变量以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和“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的问题设计指标，剔除没有明确表示去留意愿的样本，以5年为界，将未来打算留城5年以上的取值为1，将不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和未来打算留城5年以下的取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的身份认同指数identity（下文统称“身份认同指数”）。为了保证核心变量更加客观准确，本文选取了问卷中能够体现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身份认同的相关数据，并参考杨菊华等学者的做法^⑪，遵循指标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原

则，从问卷中选择了 11 个具体指标来构建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的身份认同指数，见表 1。

表 1 身份认同指数的指标选取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主观认同	城市热爱度	根据问题 503A “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 地方”，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城市关注度	根据问题 503B “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 / 地方的变化”，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主动融入度	根据问题 503C “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本地人接纳	根据问题 503D “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本地融入	根据问题 503H “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4、基本同意=3、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社会包容	本地人歧视	根据问题 503E “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1、基本同意=2、不同意=3、完全不同意=4。（反向赋分）
	风俗依赖	根据问题 503F “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1、基本同意=2、不同意=3、完全不同意=4。（反向赋分）
	生活习惯	根据问题 503G “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按程度分为完全同意=1、基本同意=2、不同意=3、完全不同意=4。（反向赋分）
就业状况	就业单位	根据问题 207 “你现在就业的单位性质属于哪一类？”，将就业单位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单位）=4、非大陆的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3、私营企业=2、个体工商户=1。
	就业身份	根据问题 208 “您现在的就业身份属于哪一种？”，将就业身份分为雇主=4、有固定雇主的雇员=3、自营劳动者=2、无固定雇主的劳动者（零工、散工等）=1。
权利保障	暂住证/居住证办理	根据问题 506 “您是否办理了暂住证 / 居住证？”，是=2、否=1。

本文对选取的 11 个指标进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1 个指标的 KMO 统计量为 0.8114，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大于其卡方临界值，且显著性值小于 0.05，说明该数据适合采用主成分因子法进行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前 4 个因

子的特征根大于 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3.10%，该数据总体上可以反映 11 个指标的总体信息。本文将提取的 4 个主成分因子归纳为流动人口的主观认同、社会包容、就业状况以及权利保障 4 个一级指标，见表 1 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描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居留意愿	是否愿意未来在本地居住 5 年以上，是=1，否=0	45843	0.6082	0.4881
核心解释变量				
身份认同指数	通过主成分因子法构建身份认同指数	45843	0.0436	0.5373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45843	0.5769	0.4940
年龄	被访者年龄	45843	35.3436	9.2817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学历为参照，高中/中专、大学、专科=1；大学本科、研究生=2	45843	0.4390	0.5841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45843	0.8512	0.3559
同住家庭人数	被访者的同住家庭人数	45843	3.2143	1.1446
家庭月收入	被访者家庭月收入	45843	6810.21	2923.033
流入地是否有房产	有房产=1，没有房产=0	45843	0.2822	0.4500
户籍地是否有承包地	没有承包地=1，有承包地=0	45843	0.4041	0.4907
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	没有宅基地=1，有宅基地=0	45843	0.2589	0.4380
流动模式	城城流动=1，乡城流动=0	45843	0.0273	0.1632
流动城市数量	被访者总共流动过的城市（包括现居地）	45843	2.0001	1.4492
流动范围	以跨省为参照，省内跨市=2，市内跨县=3	45843	1.6843	0.7562

指标构建后，对构建身份认同指数的 4 个主成分因子按照方差贡献值占累计方差贡献值的百分比分别赋权重（见式 3），最终合成为身份认同指数 $identity_i$ （见式 4）。最终，4 个主成分权重如下：主观认同所占权重为 0.4404，社会包容所占权重为 0.2226，就业状况所占权重为 0.219，权利保障所

占权重为 0.1467。

$weight_i = \frac{proportion_i}{4}$, $proportion_i$ 指第 i 个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identity_j = \sum_{i=1}^4 weight_i \times factor_{ij}$, $j=1, 2, 3, \dots$, $factor_{ij}$ 指第 j 个样本第 i 个主成分因子的得分情况

3. 控制变量。依据前人研究成果, 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三类: 第一类控制变量是流动人口 j 的个人特征变量 $feature_j$, 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第二类控制变量是流动人口 j 的家庭情况变量 $family_j$, 包括婚姻情况、同住家庭人数、家庭月收入、是否拥有房产、户籍地是否有承包地、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 第三类控制变量为流动人口 j 的流动特征变量 $mobility_j$, 包括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的流动模式、流动城市数量、流动范围。对模型变量的详细描述见表 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文献和数据类型, 本文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

$$\ln \frac{P(\text{residence}_j=1)}{P(\text{residence}_j=0)} = \beta_0 + \beta_1 identity_j + \beta_2 feature_j + \beta_3 family_j + \beta_4 mobility_j + \varepsilon_j$$

其中, $P(\text{residence}_j=1)$ 表示流动人口 j 的留城概率, $P(\text{residence}_j=0)$ 表示流动人口 j 的离城概率, 核心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 j 的身份认同指数 $identity_j$, $feature_j$ 、 $family_j$ 、 $mobility_j$ 分别表示流动人口 j 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等控制变量, ε_j 为随机干扰项。

(二)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 (1) —(4) 考察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 (1) 为基准回归模型, 模型 (2) (3) (4)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运用逐步回归方法, 依次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变量, 用以考察模型整体解释力的变化。结果显示, 模型 (1) —(4) 身份认同指数系数 β 均是正向且显著 (见表 3)。实证结果验证了核心研究假设, 即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越高, 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就越强。具体来看: 基准模型 (1) 结果显示,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效应, 回归系数 β 为 1.1662,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身份认同指数增加 1 单位,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几率比是原来的 3.21 倍 ($e^{1.1662}$)。

表 3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居留意愿
(被解释变量: 居留意愿)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身份认同指数	1.1662*** (0.0200)	1.1175*** (0.0202)	1.0326*** (0.0220)	1.0171*** (0.0222)
性别 (男)		-0.1490*** (0.0205)	-0.0398* (0.0225)	0.0186 (0.0230)
年龄		0.0235*** (0.0011)	0.0049*** (0.0013)	0.0056*** (0.0014)
高中/中专、 大学专科		0.4638*** (0.0228)	0.3650*** (0.0253)	0.2977*** (0.0257)
本科及以上		0.7598*** (0.0536)	0.6338*** (0.0607)	0.5311*** (0.0614)
婚姻状况 (已 婚)			0.5990*** (0.0404)	0.5954*** (0.0409)
同住家庭人 数			0.0894*** (0.0117)	0.0886*** (0.0118)
家庭月收入 (取对数)			0.1996*** (0.0278)	0.3376*** (0.0286)
流入地是否 有房产 (有 房产)			2.1348*** (0.0343)	2.0041*** (0.0347)
户籍地是否 有承包地 (没 有承包地)			0.0176 (0.0244)	0.0388 (0.0248)
户籍地是否 有宅基地 (没 有宅基地)			0.5467*** (0.0289)	0.5153*** (0.0293)
流动模式 (城 城流动)				0.0385 (0.0711)
流动城市数 量				-0.0874*** (0.0076)
省内跨市				0.5917*** (0.0253)
市内跨县				0.6784*** (0.0328)
常数项	0.4284*** (0.0099)	-0.5045*** (0.0454)	-2.9626*** (0.2409)	-4.2908*** (0.2492)
Pseudo R ²	0.0622	0.0742	0.2002	0.2151
观测数	45843	45843	45843	4584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模型 (2) 在加入个人特征变量后, 身份认同指数对居留意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个人特征中, 男性流动人口在城里居留意愿的几率比是女性的 0.86 倍 ($e^{-0.149}$), 即女性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年龄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多数流动人口开始组建家庭、生儿育女, 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意愿增

强。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城市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即学历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意愿就越高。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水平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高的工作技能、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和潜在工作机会，会带来更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

模型 (3) 加入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后，身份认同指数对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身份认同的估计参数进一步变小，由几率比 3.21 倍 ($e^{1.1662}$) 降为 2.80 倍 ($e^{1.0326}$)。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特征通过婚姻、同住家庭人数、经济收入等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已婚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居留意愿的几率比是未婚流动人口的 1.82 倍 ($e^{0.599}$)。可能的原因是，婚姻意味着流动人口在城里拥有了更紧密的社会关系，婚姻带来的责任感强化了流动人口追求“市民”身份的意愿，从而提高了居留意愿。同住家庭人数与居留意愿呈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流入地城市拥有更全面、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出于子女教育的考虑，流动人口倾向于城市定居以期子女未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家庭月收入与居留意愿具有正的显著性，可能的解释为家庭月收入代表了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能力，经济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居留城市的能力，家庭月收入越高，居留意愿就越强。对于在流入地没有房产的流动人口而言，有房产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潘泽泉的研究表明，房产能够反映个体社会地位并影响身份认同度，拥有房产意味着具有良好的经济能力，购房行为强烈反映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⑧。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模型 (4) 加入流动性特征的控制变量，身份认同指数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身份认同指数

由基准模型的 3.21 倍 ($e^{1.1662}$) 减少到 2.77 倍 ($e^{1.0171}$)。具体而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并无显著性影响，而流动人口的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范围均对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人口流动城市数量与居留意愿呈正相关，可能的解释是流动城市数量反映了流动人口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频繁更换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同一流入地居留的意愿并不强。在流动范围方面，相较于跨省流动，市内跨县流动的居留意愿大于省内跨市流动，即流动人口流动范围越小，居留意愿越强，反之流动范围越大，居留意愿越弱。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 2。

(三) 异质性分析

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特征差异，不同队列、教育水平及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性。本文将考察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对居留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中的模型 (5)、(6) 用来检验不同队列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性；模型 (7) —(9) 用来检验不同教育程度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性；模型 (10) —(12) 用来检验不同流动范围下流动人口对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性。

1. 不同队列的流动人口。国际移民研究表明，不同出生队列流动人口所处的社会时空、生活情境有别，致使身份认同出现差异^⑨。王春光在多年前就区分了新生代和老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差异，验证了由年龄产生的代际差异会对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我们借鉴王春光等学者的方法，以 1980 年为分割点，比较 1980 年前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表 4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代际和受教育水平差异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80 前	80 后	高中以下	高中 / 中专、 大学专科	本科及以上
身份认同指数	0.9796*** (0.0350)	1.0261*** (0.0290)	1.0193*** (0.0276)	1.0146*** (0.0395)	1.002*** (0.1216)
个人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年龄	-0.0211*** (0.0032)	0.0480*** (0.0037)	YES	YES	YES
家庭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流动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0690*** (0.4443)	-5.4279*** (0.3267)	-3.9159*** (0.3150)	-4.9819*** (0.4392)	-2.4462*** (1.2801)
观测数	17,540	28,303	27,893	15,774	2,176

表4中，观察不同年龄队列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发现，身份认同对于不同年龄队列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但对于“80”前后年龄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80后”流动人口的年龄越大，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越强。而“80前”流动人口年龄与居留意愿负相关，可以理解为“80前”流动人口群体的年龄越大，其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越弱。可能的解释是“80后”流动人口应该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已适应城市生活并对“市民”身份产生归属感，子女上学等问题客观上也要求家庭居住稳定，从而产生了较强的居留意愿。而“80前”的流动人口，已经慢慢步入中老年，身份认同感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弱，主观上可能更愿意回乡。

2. 不同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是个体经历与社会时空相互作用的产物，流动人口的家庭环境、受教育程度、从业背景等都是特定社会时空下的个体经历，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知^⑩。因此，教育程度不同的流动人口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4中的模型(7)、(8)、(9)分别报告了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高中以下、高中/中专、大学专科以及本科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系数依次为1.0193、1.0146、1.002。即对于不同教育组别来说，身份认同均是流动人口选择留城的显著正向影响因素。对于高学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可能是其在就业机会选择、就业模式决策时考虑的重要条件；而对于低学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则可能意味着城市的接纳与信任，是其选择留城的重要保障。

3. 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前面分析可知，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显著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本文通过划分不同流动范围来检验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性。表5中的模型(10)、(11)、(12)分别从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三个维度检验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于跨省、省内跨市、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来说，前文证明了流动范围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群体内部，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差异。可能的解释是，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面临着文化差异大、社会交往困难等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形成新的身份认同需要更多的成本；而省

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较跨省流动人口而言，迁移距离较小，对流入城市的身份认同感较强，居留意愿也更强烈。因此，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在不同流动模式下，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差异。我国在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应充分考虑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在吸引人口迁移方面的差异。对于大城市来说，要注重维护流动人口权益，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参与度；对于中小城镇，应鼓励流动人口返乡，加大就地城镇化的政策支持力度。

表5 不同流动范围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差异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跨省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身份认同指数	1.1012*** (0.0308)	1.0104*** (0.0402)	0.7449*** (0.0543)
个人特征	YES	YES	YES
家庭特征	YES	YES	YES
流动特征	YES	YES	YES
常数项	-3.7444*** (0.3408)	-4.4848*** (0.4466)	-3.8154*** (0.6210)
观测数	22629	15057	8157

(四)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代变量和转换变量两种方式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6中的模型(13)用“居留时间”代替“居留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一般认为，流动人口在本地驻留的时间越长，留城时间越久，其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可能就越强。因此，变量选取问卷中“如果你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的问题作为替代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显著正相关，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模型(13)	模型(14)
	居留时间	居留意愿(连续型)
身份认同指数	0.8014*** (0.0475)	0.5735*** (0.0116)
个人特征	YES	YES
家庭特征	YES	YES
流动特征	YES	YES
常数项	-3.6696*** (0.5547)	0.4735*** (0.1344)
观测数	45843	15057

模型(14)将原被解释变量“居留意愿”由基准模型(1)中的类别变量转换成连续变量，采用

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居留意愿显著正相关，表明本文的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主观认同、社会包容、就业情况、权利保障四个维度构建身份认同指数，实证检验了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城市居留意愿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感越强，在流入地定居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高于男性，“80后”流动人口较“80前”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且年龄的增长和家庭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流动人口增强居留意愿，这说明年龄和家庭变化会给流动人口带来无形的压力，年龄增长和家庭责任均会强化居留意愿。第三，受教育水平越高，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意愿越强。高学历流动人口选择空间大，身份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小。身份认同对跨省、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依次减弱，跨省流动人口面临文化、方言、习俗等较大的身份认同障碍，身份认同能够大幅增强其居留意愿，而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身份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小。

为了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本文建议：第一，消除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提高流动人口在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保障性租赁房、公共住房等方面的市民化待遇，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加大对流动人口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力度，培养流动人口持续发展能力和自身核心竞争力。如对低学历流动人口强化就业服务，建立健全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就业中介组织发展，提升劳务信息服务水平，减少流动人口的职业歧视。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可以加强地区协调，强化地区协同效应，让各相近地区分享高技术人才引进的政策成果。第三，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动员多方力量，搭建平台，加强与流动人口的互联互通，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第四，因地制宜，持续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战略，鼓励流动人口回乡

创业，加大政策扶持助力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注释：

① 周天勇：《迁移受阻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1期。

② 郑松泰：《“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5期。

④ 杨菊华、张娇娇、吴敏：《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4期。

⑤ 李燕燕、刘志山：《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三重逻辑》，《湖湘论坛》2022年第2期。

⑥ G. A. Akerlof, R. E. Kranton,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 pp.715-753.

⑦ 谢东虹：《迁移的幸福效用——基于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式双重维度的分析》，《城市问题》2016年第11期。

⑧ 祝仲坤、冷晨昕、陶建平：《社区场域与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⑨⑩ 杨菊华、吴敏、张娇娇：《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青年研究》2016年第4期。

⑩ Y. Zhu, W. Che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4), pp.253-267.

⑫ 潘泽泉：《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争辩、经验比较与跨学科范式建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⑬ R. G. Rumbaut, *The Crucible Within: Ethnic Identity, Self-Esteem, and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mong Children of Immigrant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4, 28(4), pp.748-794.

⑭ C. K. Neils, *Immigrants, Immigrant Neighborhoods, and Ethnic Identity: Historical Issu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79, 66(3), pp.603-615.

作者简介：孙红玉，湖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叶学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陈孝兵）